

媒介环境学派的理论困境与符号学取向

／ 胡易容

【摘要】媒介环境学派，是以多伦多两位媒介巨匠英尼斯和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传播理论范式。半个世纪以来，该学派已发展至第三代学人。在简要回顾媒介环境学派核心理论体系发展的基础上，文章指出媒介环境学派面临一些理论创新的深层次问题。通过媒介环境与符号环境的内在关联研究，提出媒介环境学派方法论融合创新的线索之一，是将媒介环境视为一种基于符号结构的“软”环境，以更切适于新媒体环境下人与媒介交互关系机制的研究。

【关键词】媒介环境学 符号学 麦克卢汉 传播学范式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687(2015)02-0070-05

DOI:10.13786/j.cnki.cn14-1066/g2.2015.02.015

一、媒介环境学派的技术认知与符号视野

媒介环境学(Media Ecology)是20世纪30年代在北美萌芽，于70年代蓬勃发展起来的一个传播学范式，其主要推动力量是媒介环境学派。经过三代学者的努力，媒介环境学派已蔚为大观，成为传播学领域具有重要地位的一支力量。学界通常认为，媒介环境学派是由尼尔·波兹曼创建，其理论根基是从媒介对讯息形态的框架性影响出发，研究媒介在人类社会和文化中的总体作用和长期影响。媒介环境学派发展近50年来在中国的影响巨大，许多学者将媒介环境学派视为与“北美经验学派”“批判学派”并列的“第三学派”。

要厘清媒介环境学和媒介环境学派的范畴，就要区分这两个概念。媒介环境学是一个研究范式，而学派夹杂了师承、地缘等太多人为性要素。在学术资源充分共享的今天，师承和地缘都相对弱化，相近的研究取向往往成为区别一个学派的重要标志。有学者给媒介环境学做了如下定义：“媒介环境学从媒介本身的特性出发，

研究各种媒介组成的媒介环境（特别是其中的主导媒介）及其变化已经或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1]该定义的外延本身非常宽泛，可以包括“任何能运载信息和物质的介质”，如汽车、衣服、窗户、照片……以此而论，^[2]罗兰·巴特研究“摄影”“服饰”，西梅尔研究承载价值信息的“货币”都与媒介相关，因而也可以说他们的研究与媒介环境学理论有一定关联。“媒介环境学派”的群体界定要狭窄得多，其特指以英尼斯、麦克卢汉为先驱，以波兹曼及其发起的媒介环境学会为标志和核心基地的学术群体。该学派所理解的“媒介环境学”是一个基于学派传承和研究的范畴。1968年，媒介环境学派的实际创始人波兹曼公开介绍媒介环境学。他指出，媒介环境学试图揭示媒介隐含的、固有的结构，揭示它们对人的感知、理解和感情的影响。其深层理论命题由3个互相联系的理论命题构成：（1）传播媒介非中性：媒介的物质属性结构和符号形式具有规定作用，对信息的编码、传输、解码、储存产生影响，对支撑这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当今文化现状与发展的符号学研究”(13ZD&123)；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三网融合时代重大灾害中的科学传播及其机制建设研究”(12YJA860011)。

【作者信息】胡易容，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后，桂林电子科技大学艺术与与设计学院副教授、数字媒体系主任。

些传播过程的物质设备也产生影响；(2)传播媒介有偏向性：思想情感偏向、时空和感知偏向、政治偏向、社会偏向、形而上偏向、内容偏向、认识论偏向等；(3)传播技术对文化产生影响。媒介通过自身的偏向影响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3]

上述表述中，传播媒介的物质属性和“符号形式”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此后，媒介环境学派对自身的界定几乎从未脱离符号要素的参与。媒介环境学派第三代学者林文刚对所谓“媒介环境”作了3个界定：一是作为感知的媒介环境。二是作为符号环境的媒介——我们掌握这些媒介或一种媒介时，自己同时又融入了这种符号环境中，这个符号环境也就是媒介环境本身。三是单一媒介环境或多重媒介环境。^[4]从这个界定可以看出，媒介环境的研究并非研究孤立的“技术媒介”，而是研究媒介与人之间的“环境”，这一环境正是经由“符号”而存在的意义世界。这种“符号化”的存在方式往往被学界所忽略。其中重要原因，是媒介环境学派的学者没有充分区别“以物质形态存在的媒介环境”和“作为感知对象的符号环境”。

首先，作为技术实体的媒介，并不存在于人们的感知中。一旦进入感知，环境就成为了某种“符号语境”。那些看来纯属自然性质的知觉，实际上都是在具体的元语言规则下的“文化解释”。没有语境，甚至无法谈论任何一个物理事实。如中国气象局用“龙王”来命名台风，西方世界并不存在“黛青色”这一物理属性的称谓。这表明，只有身处文化之中，才能有效地感知所谓物理事实。其次，媒介技术并不是构成“环境”的全部要素，至多是人们意义获取过程的对象要素部分，而主体要素、语境要素、伴随文本要素，则是符号环境在更宏观层面上提供的信息。由此，符号环境是与人感知更为切近的世界，它构筑人类社会的意义世界。媒介技术需通过符号来作用于人的感知，并进入人类社会的意义世界。再次，上文所述的“感知环境”与“符号环境”并非两个不同的环境，而是一体两面的关系。保罗·莱文森、约书亚·梅罗维茨等都不约而同将“符号环境”与“感知环境”视为媒介与人的关系的两套环境，并认为，人们使用媒介来获取信息或与人交流时，并非总是有意识地区分感知层面和符号层面。

不过，媒介环境学派学者并未在理论上仔细阐述如何来区别“符号环境”与“物理环境”，这也是导致媒介环境学派被简单归纳为媒介技术至上主义的重要原因之一。实际上，符号学领域已充分论辩了媒介环境与符号环境的本质差异，尤其是对“感知”与“符号”关

系的讨论，对媒介环境学派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符号被定义为“携带着意义的感知”。^[5]也即进入意义就进入了符号世界。即便是最基本的物理事实，一旦发生以“人”为主体的解释活动，即进入了符号领域。不加解释的直观感觉是存在的，但“不加解释”一旦进入人们认知范畴，就已进入人们预设的元层次的解释。此时，“不加解释”本身也是一种解释，如不加解释的沉默、没有释文的天书、艺术家的抽象作品，都拒绝了某种方式的解释，但无法阻止人们在另一个层次或前后文关系下理解作品本身。此外，作为人的“感觉”，是生理基础在人类社会的特定符号作用下的结果，而非动物或植物的“刺激-反应”，更非机械水平的物理数据反馈。因此，并不存在毫无意义的人类感知——媒介环境的两个呈现形式“感知”与“符号”都可归到“符号环境”中加以解读。

综上，“媒介环境学”也可看做是研究以“媒介-符号”为形态约束的人类文化的学科。换言之，媒介环境学的基本研究对象也可以说就是“符号环境”。可见，符号学路径与媒介技术研究路径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媒介环境学派当前面临的一些问题，恰恰是将这种符号环境与技术环境鸿沟化的结果。

二、媒介环境学派的困境与反思

1. 学术传承机制与群体的自限

前文指出，就理论范畴而言，“媒介环境学”是比“媒介环境学派”更严谨的学术范式概念。但作为一个学派，其理解的媒介环境学，显然受到了以人的传承为线索的狭窄边界意识的影响。这一方面体现在后续学者的培养体制上，另一方面也体现为这一学派对其学者的“界定”。1970年，尼尔·波兹曼在纽约大学创建并主持媒介环境学会的博士点。他们和麦克卢汉一脉相承，所以波兹曼坦承，他们是麦克卢汉的孩子：“到1996年，我们有100多位学生拿到了博士学位，400多人拿到了硕士学位。”^[6]这种自我繁殖的方式，固然利于一种学术思想的播撒，但对于学术的创新则未必是最佳选择。麦克卢汉与英尼斯的“模式识别”方法，是一种跨学科的综合方法，单一的学院教育恐不是这种精神的最佳传承方式。1998年8月4日，媒介环境学会(Media Ecology Association)在纽约宣告成立，学会自称继承了英尼斯、麦克卢汉的媒介研究思想，其精神领袖是尼尔·波兹曼。

由此，媒介环境学派在以硕博培养和学会的方式

宣告了自身的发展的同时，也局限了其从学理本身拓展“媒介环境学”的范畴认知。作为一种思潮的“媒介环境学”，可以界定得很宽泛，但媒介环境学派却有自己“三代四辈”的门户区隔。按照何道宽的说法，这个学派自身的传承，“如果兼顾生物学意义上的世代和学术思想传承的时代，那么媒介环境学每20年为一代，已经走完了三代人的历程，加上先驱可算四辈：20世纪50年代以前成名的格迪斯、芒福德、沃尔夫、朗格等人是先驱；50年代成名的埃里克·哈弗洛克、哈罗德·英尼斯和马歇尔·麦克卢汉是第一代；尼尔·波兹曼、沃尔特·翁、詹姆斯·凯利等人是第二代；保罗·莱文森、约书亚·梅罗维茨、兰斯·斯特雷特、林文刚、埃里克·麦克卢汉、德里克·德克霍夫等人是非常活跃的第三代”。^[7]

媒介环境学派此种自我界定，自限了媒介技术理论与其他学科的广泛内在联系，这可能与媒介环境学先驱们的意愿背道而驰。被称为第一代媒介环境学者的沃尔夫是一位语言学家，他的理论强调语法结构，深具形式论色彩；刘易斯·芒福德是一位技术哲学家和城市形态理论家；苏珊·朗格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符号学家和美学家——她的重点不在技术性媒介的作用，而在于符号的形式。实际上，苏珊·朗格的符号形式论在早期媒介环境学派的理论体系中，并不属于主流。第三代学者逐渐倾向于重视符号学家苏珊·朗格的符号理论，并将这些理论用于补充媒介环境学。如香港浸会大学的鲍威尔斯（John H. Powers）教授认为，苏珊·朗格的遗产“恐怕是媒介环境学家构建系统理论，最有价值的资源之一”。^[8]这一方面表明，符号学对媒介环境学的不可或缺；另一方面也表明，媒介环境学不能仅仅局限于“麦克卢汉的孩子们”所组成的这个学派。如果割裂了其他学科对媒介研究的给养背景，媒介环境学派在学术视野的维度上，将显得尤其单薄。

2. 理论范式的深层危机

媒介环境学派的核心人物麦克卢汉本身的著述方式是非学术的，他的重大贡献在于视角的开启而非学术方法论的体系化建构。这就导致后继者们如果仅仅继承他的观点，会导致自身学术方法论的不足，同时，观点本身最后也会因时间而变成一种陈旧的重复。这正是媒介环境学派当前面临的更加严重的问题。对于现在的媒介环境学来说，这体现在三个方面。

（1）理论锐度的弱化。一种开创性的理论往往伴随着某一个或一组核心概念范畴。康德的“知性”、黑

格尔的“绝对精神”、弗洛伊德的“力比多”、海德格尔的“此在”、索绪尔的“能指/所指”都构成了一个学术系统的核心概念，并以此为基点进行展开。这些核心范畴因其对原有观念的颠覆性而具有理论的“锐度”。这种颠覆并不意味着“更加正确”。这些理论之所以锐利，是由于颠覆了既有的观念，并丰富了人类自我认知的维度。媒介环境学在经历数代之后，理论锐度正在逐渐被削弱。第三代媒介环境学者将媒介环境学的理论立场做了一种学术进化论意义上的区分，分别是：硬决定论（英尼斯、麦克卢汉），软决定论（莱文森、梅罗维茨），技术和文化共生论（林文刚）。以林文刚为代表的学者认为，这3种偏重不同的理论概括构成一个连续体：处于两极的是硬决定论和软决定论，处于中间的是共生论。他本人持“文化/技术共生论”，并认为人类文化是人与技术或媒介不间断的、互相依存的因而互相影响的互动关系。从硬决定到软决定，再到技术与文化的共生论，无疑这一理论看起来更“正确而全面”，然而从一种理论所秉持的逻辑起点来看，却无异于对理论的锐度进行了自我阉割。先辈麦克卢汉具有颠覆性的理论洞见，在后继者们不偏不倚、不错不对的命题中，逐渐丧失了鲜明的理论个性。

（2）近乎中庸化的理论立场间接导致了理论创新力的局限。媒介环境学派的主要理论仍然集中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关键命题上。媒介环境学派自设的3大深层理论命题分别为：媒介不是中性的渠道；媒介的物质特征与符号特征带有一定偏向；软决定论、硬决定论、共生论的理论连续体。^[9]这些命题仍是在讨论麦克卢汉与英尼斯的遗产问题。这导致在面对新媒介和新新媒介的当下现实情况时，媒介环境学派显得裹足不前。以“媒介历史分期”为例，英尼斯提出了以媒介为坐标的人类文明历史分期表（10个历史分期构成的两大文明形态），自从麦克卢汉对英尼斯的分期进行过重要的推进后，半个世纪过去了，媒介环境学派仍将其奉为圭臬。今日天翻地覆，地球村已不是那个地球村。如果麦克卢汉用I-phone在社交上发布他灵光闪现的箴言时，会怎样描述今天的媒介世界？媒介环境学后继者面对一日千里的媒介景观，却仍固守麦克卢汉留下的媒介历史四分法——口语、文字、印刷、电子。^[10]特别值得商榷的是，在新媒介语境下，电子文明作为一种介质手段，无法呈现出媒介传播模式的根本性变化。麦克卢汉时代的单向度传播主导，是他人体延伸论的主要现实依据。麦克卢汉的“人体延伸论”中，将电视作为终极媒介形态描述为“神经中枢”的延伸。而web2.0以来的媒介交互

现实，不仅延伸了神经这感知的官能，更延伸了主动操作能力。远程桌面可以用鼠标轻易控制地球另一端的电脑，以及任何与之连接机械，而实现手术、远程管理等如其在场的操作。这种全面的交互式参与，与麦克卢汉所说的地球村本质上是大为不同的。当我们在web3.0甚至4.0时代，身处全媒体（omni-media）的包围的我们，仍以陈旧概念来描述它们，已显得非常不合时宜。

（3）麦克卢汉本人并未完整地建构系统方法论。他不加论证的箴言虽为之获得了诸多声誉，却无法遮盖他的系统方法论方面的缺憾。英尼斯、麦克卢汉，以及后期的梅罗维茨的方法之间，缺乏一种一以贯之的提供持续研究的理论指导。换言之，媒介环境学唯一的共同点，不是来自于方法论的体系化建构，而是来自于研究出发点的立场近似——媒介决定。英尼斯的总体场论是一种看待问题的总体性策略，他的著述实际上是一种史料例证——《传播的偏向》《帝国与传播》都是如此；麦克卢汉则是文学艺术批评断言家，他的著述更多天马行空的引用，难于形成一种体系性的学术方法论，其主要命题为后继者留下了巨大的解释空间和阐述工作；梅罗维茨从社会学角度，结合定量研究，论证了麦克卢汉的媒介重要性，沿袭并重申了英尼斯的“绕过”理论。^[11]他最重要的著作《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2002）堪称对“绕过”理论的一个定量研究的例证和脚注；保罗·莱文森总结了麦克卢汉的理论，并应用到数字领域，但在方法论方面，并未提供更多线索。

回顾半个世纪的媒介环境学历程，后继者已感到有必要建立整个“理论体系”。他们认为，这是一套有关“媒介与符号关系”的体系。鲍威尔斯教授明确指出，苏桑·朗格对媒介环境学的未来潜在命题具有极大启发性。朗格的符号形式与媒介传播形式具有某种“对应”效果。他进一步论述，皮尔斯的符号三元关系是一般意义运作的总体结构。而符号媒介的分类就是基于“一种推理性符号与表征性符号”的标准。^[12]

三、符号学方案与“媒介环境学”的内在关联与融合发展

如前文所述，“媒介环境”可内在地视为一种“符号环境”。正是符号而非外在于意义的物理媒介构成了人们所感知的环境世界。媒介环境学理论体系弱势能借助符号学得到有效弥补。麦克卢汉探索而不解释的特征，给后继学者带来的困难，须具有某种方法论意义上的补充——符号学因其系统解析力与媒介环境学，具有良好的互补性。媒介环境学的模式识别方法，可置之符

号理论体系中来发展，模式识别及其所主张的跨学科研究方法，在符号学中可能得到更好的印证。某种意义上说，媒介环境学者所追求的某种体系性的建构，是索绪尔以来的符号学的重要特征和优势所在。基于这些学理上的契合性，媒介环境学与符号学具有更进一步的融合发展空间。可以初步判断，在如下几方面，媒介环境学与符号学的融合将产生理论的新洞见。

一是加强以符号学为代表的跨学科方法论融合，吸纳其理论方法用以自身体系化建设。从索绪尔、皮尔斯到苏桑·朗格，都在他们的研究中不乏意义与介质形式的研究。这一巨大的思想宝库对传媒研究的巨大价值，目前仅仅揭开了冰山一角。将会有更多的学者在这条“传媒-符号”的理论道路上前进。学科称谓的差异，并非一种学术系统对另一种学术范式的“侵蚀”，而是学术传统之间的交融与相互激发。如果我们拒绝这种激发而排斥对其他学科的进入，无疑不符合麦克卢汉等媒介环境学先辈的跨学科初衷。因此，传媒符号体系不仅是媒介环境学派不可回避的研究课题，也是整个传播学理论体系发展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

二是加强对新媒体模式变化的理论转换与洞察，以此突破对麦克卢汉时代经典论断，以形成更具当下解释力的理论创见。从媒介环境学与符号学融合角度来看待今天的社交媒体将会具有另一些新的视角，这个视角是一个基于传媒符号学的视角。目前国内外学者已做出初步努力，如比格内尔的《传媒符号学》（2012）在分析广告、杂志、报纸等不同媒体内容文本时，大量采用了符号学分析方法。再如胡易容《传媒符号学：传媒符号学后麦克卢汉的理论转向》（2012）在媒介技术分析的基础上，融合了媒介形态与内容创意的概念，在“媒介创意”篇章中，打破了内容创意与媒介创意的边界，对媒介形态进入内容创意，进行了理论分析与实践应用。实际上这些具有创见的观点正是借鉴了麦克卢汉传媒理论中“媒介即讯息”的视角，又兼以符号学的方式讨论了具体传播案例中内容与媒介形态的协同作用。这种方法融合视野的探讨在处理多模态、交互性为特征的新媒体中具有特别的优势。这是由于，以各种网络和数字化方式存在的新媒体本身不具有特殊的媒介物理性状，其本身所呈现的交互方式即是一种符号感知结构。

可以预想，沿着这种融合、汇通的路径来探索新时代的媒介环境学与符号学理论，将会对媒介环境学整个理论体系的建设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假以时日，我们有理由相信媒介环境学在体系化方面会更进一步，成为传播学研究领域更具影响力的重要范式。

参考文献：

- [1] [2] 李明伟. 知媒者生存：媒介环境学纵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40，41.
- [3] [4] [9] [10] 林文刚. 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7-33，28-29，30，33-34.
- [5] 赵毅衡. 符号学：原理与推演[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1.
- [6] [加] 波茨曼. 麦克卢汉：媒介及信史（序言）[M]. 何道

宽，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7.

- [7] 何道宽. 媒介环境学辨析[J]. 国际新闻界，2007（1）：46.
- [8] [12] 鲍威尔斯. 苏桑·朗格的心灵哲学：媒介环境学的一些潜在命题[M]// 林文刚. 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34，234-253.
- [11] [美] 约书亚·梅罗维茨. 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M]. 肖志军，译.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13.

The Media Ecology: Current Theoretical Predicaments and Semiotics Tendency

HU Yi-rong (Tsinghua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media ecology refers the kind of media study on basis of Harold Innis and Marshall McLuhan's media theory. It has passed on to the third generation in half a century. But now the theory faces with some dilemmas in the process of theory innovation. The paper discusses a integrated method, that we see media as not only a cold techniques but also a kind of symbol constructing. In such "soft" environment, people could learn more from interaction between human and media.

Keywords: media ecology; semiotics; Marshall McLuhan; communication paradigm

（上接第36页）[5] 周宪. 读图、身体、意识形态，文化研究[M]. 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72.

[6] European Commission.Green Paper on the Convergence of the Telecommunications,Media,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ectors,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Regulation [R]. Http://www.ispo.cec.be, 1997.

[7] 柳斌杰. 加快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的融合发展[J]. 现代出

版，2001（4）：5-8.

[8] 刘成付. 视觉文化传播：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J]. 现代传播，2005（1）：27-29.

[9] 白杰，董海博. 移动阅读的市场现状与发展[J]. 出版广角，2013（9）：22-25.

[10] 赵蕾蕾. 阅读对大众文化的影响——彼得·苏尔坎普的《读者》[J]. 当代艺术与投资，2010（10）：96.

Analysis on the Development Situation and Trend of Books Dissemination in Mobile Reading Era

FAN Yu-ming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Azhadan · simayi (Xin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Abstract: With the substantial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readers of mobile reading, reading habits and consumption concept are taking shape. At present, APP and WAP are the main models of dissemination. The type of best seller reflects that readers pursue entertainment and spiritual happiness. In mobile reading era, we should focus on readers, develop personalized, multimedia and integration dissemination with big data technologies.

Keywords: mobile reading era; books dissemination models; personalized dissemination; multimedia dissemination; integration dissemination; reading requirements of readers; books dissemination environment